

齐红为官员拆窃听器

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现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他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没法和别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过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知道他的,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者、欺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我。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名声在官场上传开了。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话得去洗浴中心谈,”他说。这让在座的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在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

——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在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查查查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现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与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查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讲,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下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但依然失落的口吻说。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朋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窃听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就像做错事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他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窃窃听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的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眼睛在我头上左顾右盼。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据《南方人物周刊》)

事业单位招聘加分乱象:少数考生加分超笔试成绩



参加2012年三门峡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考生正在报名

11月23日,湖南省新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县政府网站上发布《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专业人员公告》,公告中并没有出现给予特定群体加分的规定。而此前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发布的《2012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中,却有一项“卫生加分”:“对在我县各医疗卫生机构临时聘用的人员实行工龄和专业技术职务累计加分。其中取得初级(士)职称的(含执业助理医师)的加3分;取得初级(师)及以上职称的(含执业医师)加5分;在我县各医疗卫生机构临时聘用的人员每满一周年加1分,工作年限加分最高不超过5分。加分加在笔试成绩折合之前。”

有考生认为,这一加分违反了湘人社发[2011]45号文件规定。

记者查阅,比较了一些地方2006年至今发布的数百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公告或简章后发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各自为政”,乱象纷呈。最常见的加分类型为“大学生村官”,此外还有“独生子女或农村二女户”、“退伍士兵”、“退伍大学生士兵”、“少数民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

如何规范事业单位招聘加分,杜绝人事腐败,有些省份已提出取消加分的计划。另外,也有专家建议,用定向招录代替加分。

事业单位招聘加分引起的争议不仅出现在湖南。近年来,多地都发生过关于加分的蹊跷事儿。

今年8月,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第一名被毕业7年还是“未就业毕业生”的第二名蹊跷加分超越。

2010年,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的事业单位招聘曾出现51分额外加分:一名考生实际笔试成绩只有44.3分,而额外加分竟达到51分。

在网上,记者也发现了一些考生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加分情况的质疑帖。

网友“海晴天”在人民网海南视窗《百姓声音》栏目以《琼海2012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存在违规》为题发帖:“琼海事业单位招聘卫生系统以及琼海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管理存在加分。我不知道如此加分是否有文件规定,该不该加以及加多少,且加分的考生没有进行公示,加分不加分谁来监督?”

一名四川考生以“2011简阳市事业单位招聘政策性加分的疑问”为题发帖:“明确规定政策性加分最高不超过6分,可在简阳市2011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政策加分登记表上看到,加分最高居然高达18分,请问是否符合规定?”

对于各地事业单位招聘加分“各为其政”的现象,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建钟认为:“不能由行政部门的主观判断随意性制定加分政策,决策应该是法定化的。制定政策要坚持民主法制的原则,既要有法定授权,也要有民意的反馈。”

“公开招聘就是为了实现考试的公平公正,任何加分都是对特殊群体的照顾,也是对其他群体的一种歧视。”李建钟告诉记者。

(据《中国青年报》)